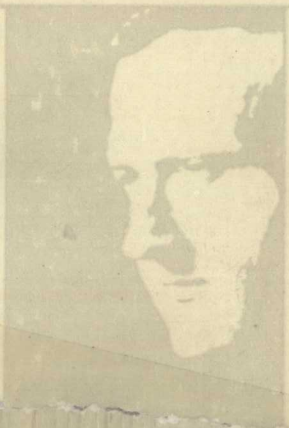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目 录

论文选译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从武昌起义到就任临时大总统

堀川哲男 (1)

孙中山和惠州起义 横山宏章 (13)

辛亥革命运动与旅日华侨 松本武彦 (22)

国民革命时期 (1925—1927年)

的武汉工人运动 久保亨 (36)

士绅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一个假说 市古宙三 (55)

略论中国资产阶级与国家、革命的关系

白吉尔 (72)

辛亥革命与日本人

伊原泽周 (92)

书评、读书札记

评横山英编《中国的近代和地方政治》

味冈彻 (110)

史料、史迹介绍

日本的辛亥革命遗迹与史料(3)……………松本武彦(123)

学术动态

南朝鲜中国史研究的开展……………闵斗基(130)

南朝鲜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闵斗基(146)

学术往来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后记

……………野泽丰(162)

中山大学“孙中山学术讨论会”参加记

……………藤井升三(170)

海外研究者介绍

野泽丰……………赵 军(176)

· 简讯 ·

· 编后 ·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从武昌起义到就任临时大总统

日本京都大学 堀川哲男

我在写文孙评传的时候，常常为一种现象而感到困惑，那就是虽然已经找到了各种必要的基本资料，却觉得难以完全照资料上所说的那样去写，怎么也不能下笔。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从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到同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为止这一阶段的历史。香港兴中会是由孙文集团和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集团联合组成的，成立于2月21日，但兴中会总办（即会长）的选举，却是在经过了近八个月时间之后的10月10日才进行的。香港兴中会最初就是以乘甲午战争带来的混乱发动武装起义为目的的实践性组织，然而它一直到起义发动的前夕还没有能够确定自己的最高负责人——总办，这是非常反常的情况，就中人们可以窥出其内部两派力量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激烈程度。结果是杨衢云当选为总办，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但是问题也就出在有关这个选举过程的记载上面。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这样说：根据选举孙中山虽然当选，但由于杨衢云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为了避免分裂，孙中山又主动将位置让给了杨。我们可以举出两本有代表性的年谱为例。《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1969年

版)上说:“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衡云,并戒士良、少白息争”;《孙中山年谱》(北京1980年版)上也说:“选举时发生严重分歧,鄧士良、陈少白等属意孙中山,谢纘泰等则推拥杨衡云。孙中山为避免分裂而谦让,结果杨衡云当选”。两书依据的都是冯自由、邓慕韩的说法。对于这件事,支持杨衡云的谢纘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一书中记载说:“杨衡云当选总理,孙逸仙博士大不高兴。这事常使他耿耿于怀。1896年10月12日,黄泳商强烈遣责孙的无能时表示‘我将来要与孙断绝关系’。”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相当不一样的印象。当然,《国父年谱增订本》的作者也引用了《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的记述,但将其斥为“为杨所辩者”,而最后还是确定“依邓慕韩、冯自由二氏之说”。

两种主张争论下去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已很难判定,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些记叙可以确认以下各项事实:当时围绕着理应及早加以解决的总办选举问题,孙文派与杨衡云派两势力间进行了长期的拮抗,两者间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甚至对广州起义的成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野泽丰先生依照冯自由的说法,用“据说最初是孙文当选,但杨衡云又施加了压力,夺走了这一地位”,“这件事情,是孙文当时还没有在组织中确立自己领导权的一个反映”①之类词句来表述当时的历史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见解。

要言之,我在这里想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选举总办一事上存在着用杨衡云的权力欲望和孙文的谦让美德这样一些人格上的评价来解释历史的倾向。如果再进一步推论一下,是否可以说在凡是论及孙文的情况下,总是存在着某种

程度的“避讳”——这样说也可能言重了一些，但至少也可以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顾虑”呢？这与一般传记著述中所通有的弊病——主题中心主义略有不同，因为孙文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上的人物：一提到孙文，人们头脑中立刻就涌出了他作为“国父”或者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形象，然后以此为起点来追述他以往的生涯。用倒溯的方法来追寻按照自己发展规律完成的历史，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表现手法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说它说明了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反过来看人们也不能否定这件事也给评价、叙述孙文的工作设置了一个无形的框架。除了香港兴中会总办选举问题之外，我们在许多人论述有关1907年以后中国同盟会内部的纠纷问题、中部同盟会的性质问题、武昌起义之后孙文的行动与作用问题、二次革命以后孙文与黄兴的关系问题、“二十一条”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孙文对日本的态度问题以及国共合作问题的论著中，或多或少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共同倾向。以下我们从中举出一个问题，即武昌起义之后数月中孙文的行动问题，来作点简单的考察吧。

孙文知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是在起义发生的两天以后，他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旅馆中吃早饭时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关于这次起义，孙文除了从黄兴那里得到的一些间接情报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什么也不知道。这里面除了孙文当时正在远离祖国的美国居留一重原因之外，大概还有两重

更重要的原因：其一是推动武昌起义计划实行的湖北集团与孙文及孙文集团的关系比较疏远；其二是以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为目的而成立的中部同盟会集团，由于不满孙文集团在南方进行的军事投机性质的武装起义而带有一种可以称作分裂活动的性格。

为什么形成了这种局面？它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

（1）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以孙文等人为主导而发动的屡次武装起义，给清朝的统治体制以严重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崩溃过程，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定评；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起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它反过来也使革命阵营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成为促使同盟会内部矛盾扩大的原因。

（2）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孙文离开日本，之后在同盟会内部（以东京本部为中心）就出现了对孙文的领导权表示不满的声音，围绕着革命资金的筹措、使用问题对孙文的非难格外强烈，几乎使同盟会面临分裂的危机。1909年10月末，孙文致函巴黎的吴敬恒，请他在《新世纪》杂志上针对反孙派攻击自己“借革命之名诈取金钱”的诽谤澄清事实，以释众疑②。这件事本身已反映出了事态的深刻性。

（3）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是为了打破由于革命处于闭塞状况而导致同盟会内部矛盾扩大、孙文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开始向恐怖主义倾斜局面而策划的起死回生的一击。孙文在后来回忆这一次起义时说：“是役也，集合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这个总结，从革命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不能说不正确，但就起义失败之后当时的情况来看，它却使孙文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决定性的伤害。结果黄兴感到自

已对多数牺牲的同志负有责任，欲组织暗杀团，孙文也不得不表示同意^③。孙文此时在革命阵营中领导地位的低下，正是他日后不能在辛亥革命中充分发挥其领导权的一个根源。

(4)1911年7月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是以对孙文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宋教仁、谭人凤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性质，吴玉章曾提出：“这个组织虽然称为同盟会的下属机构，但从它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由于对同盟会的领导怀有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这里所说的“对同盟会的领导怀有不满”，实际上就是“对孙文的领导怀有不满”的意思。正如吴玉章所指出的那样，同盟会本身在这个时候在组织上已经陷入了溃散状态。

(5)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党人集团，一直处于与孙文最为疏远的关系位置上，孙文也始终无法参与、指挥他们的活动。只有中部同盟会才与湖北集团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正由于武昌起义及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是由湖北革命党人集团与中部同盟会势力发动、推进起来的，所以辛亥革命从其爆发之初开始，就规定了孙文及孙文集团在这场革命中只能拥有低得不能再低的领导权。

通过以上各点分析不难看出，武昌起义是在对孙文等人最为不利的情况下爆发的，应当怎样来对待这场革命、采取什么措施呢，这对孙文来说确实一个难题。孙文所说的“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④也可以说含有这样一重意义。

但是，迄今为止记录孙文在武昌起义之后的行动与思考的著述，都是根据孙文后年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所作的回忆来描述这段历史的。按照孙文所说，他在这时面对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问题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立即归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另一个选择是基于“此时吾

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的判断而作的决定。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即外交折冲的道路。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种选择在当时对于孙文来说究竟是不是轻重相等、距离相等？孙文选择前一条道路即立即回国参加战斗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呢？我的结论是：对于孙文来说，选择前者的道路当时是被封闭着的，或者至少也可以设想它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孙中山要想使自己立即回国、“亲与革命之战”的愿望得以实现，最低限度要有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孙文长期以来一直依为革命据点的广东的解放。所以孙文必须暂时等待一下，等待自己的直属势力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

但这个时候，孙文直属势力的大多数人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对于他们在武昌起义以后的动向，孙文自己也不全然了解。孙文即使想跟他们一起活动，但东南亚各地的大门对于他来说也是封闭着的，所以他已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不管怎么说，确保广东对于孙文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0月下旬（或者是11月下旬）他从纽约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告以“民国已成，列强公认，请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两粤幸甚”⑤，催促张的“反正”。12月下旬孙文返回上海后，外国记者质问他：“现今政府训练一共和军队，但所募之兵俱属上海下流人物，纯系生料，果能有战斗力否？”对此，孙文回答说：“广州现有军队十万人，虽未久经训练，然均若殖居非洲婆尔人之善战”⑥。若非自己的直属势力已经统治了广东，孙文是不会说出“广州现有军队十万人”这句话的。

用孙文直属势力胡汉民等人对于夺取广东的强烈愿望也可以说明这件事情。为了在今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

保持一定的发言权，他们必须在广东建立据点并巩固之，而且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才能迎接孙文的回国。

三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风暴席卷各地，从11月末到12月上旬间，独立各省就开始议论中央政府的成立及首脑的人选问题，但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广东政权对这一动向的反应却显得有些过于冷淡。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了以谭人凤为议长的各省代表会议（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时，“广东光复”已有二十余日，各种体制略已完备（胡汉民自己也是这样讲的），但广东却没有向上述会议遣送代表。当时，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十一个省选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谭人凤是湖南的代表、中部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对孙文一直持批评态度。另外，胡汉民等人曾应黄兴的要求，答应派兵增援湖北，并任命了姚雨平为北伐军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⑦，但这支军队却迟迟没有行动。12月8日，黄兴打电报给胡汉民，请他于12月14日以前急赴南京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⑧，胡汉民仍然稳坐不动，一面观望北方的形势，一面等待孙文的回国。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集团有这样一个设想：首先巩固广东，然后以此为根据，与南下的袁世凯势力决一死战。正是出于这一设想，孙文归国之际，他们才反对孙文北上，主张暂留广东、专心养兵的。

在此之前，由于立即归国有诸多困难而选择了东行路线的孙文，经圣路易、芝加哥、纽约等地，11月初才远航英国。这时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这样三个：（1）促使列强

中止向清政府提供的一切借款；（2）与列强洽谈对革命政府的借款；（3）“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个问题里，第（1）和第（3）个问题通过维加炮厂经理道森的中介与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进行了交涉，取得了英政府口头上的同意；但孙文最为重视的筹措资金一事，虽然与伦敦四国银行团的代表以及巴黎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进行了会谈，结果也没有获得成功。在11月23日的会谈中，西蒙解释了拒绝提供财政支援的原因，那就是四国银行团及其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决定采取严格中立的态度，既不向清廷提供支援，也不向临时革命政府提供支援^⑨。这样，孙文在欧洲只完成了自己预定要解决的一部分课题。从实质上看，第（1）与第（2）个问题互为表里的，如果解决了第（2）个问题，他可以说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时第（1）个问题的解决也许只应称作消极的成果了。孙文回国后，大力宣传了第（1）个问题的成果，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未必完全是他努力的结果。

孙文深知革命战争同时也是资金筹措力的战争的道理，所以在英法等国筹划借款活动的失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12月25日，返回上海的孙文在回答《大陆报》主笔的询问时，曾说过“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的名言^⑩。据《孙中山归国始末记》^⑪，这部分一问一答的具体内容如下：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

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这个对话中，主笔所说的“革命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其实正是孙文自己的主张，而孙文当时所说的那句“名言”，其实是应当看作对筹措借款活动失败而作的充满苦涩的解释。假定孙文的借款活动成功并在这个时候公开了这种可能性，那他此后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以及革命政府面对袁世凯的活动而采取的对策，一定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的。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状况下踏上归国之途的孙文，12月21日在香港受到了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廖仲凯等人的迎接，并和他们一起商讨了今后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对策。据胡汉民所说，当时的情况是“屏人熟议，自晨至晚，争论始决”，可见讨论内容之深刻。如前所述，胡汉民等人的主张是孙文留在广东，在广东建设根据地，养兵蓄锐，以待袁世凯之南下与之决战，这种思想当然可以称为“广东割据主义”。对此，孙文也叙述了自己的主张⑫：

“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因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结果，孙文说服了他的同志，胡汉民等人也随他踏上了北上之途。我们究竟把这看作是孙文卓越的见识呢，还是把它看作是孙文对自己力量的过信、对自己在清末革命史上地位的自负呢？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武昌起义之后不久的孙文，在革命阵营中似乎让人觉得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在组建临时政府及其首脑人选的众多议论中，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上海、南京，都没有人提出过孙文的名字，也没有人倡议邀请孙文回国。这里面当时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广东集团的革命党人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过有关的议论与活动，但是即便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少还是让人不免产生异样的感觉。唯一例外的倒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他早在11月14日就通电各省都督，提议邀请孙文回国^⑬，但也不知道最后是否真的发出了邀请。直到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才表示“孙中山将次归国，可当此任”，力辞此职。但是，即使是黄兴，在12月9日致汪兆铭的书简^⑭中也说过这样的话：“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情，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他表白自己不得已而暂时充任大元帅，只是为了等待袁世凯的“反正”，组成正式政府。看来，要不是“上海”与“武汉”之间围绕着首脑人选问题发生了龃龉，孙文后来很可能还当不上临时大总统。事实上，正是由于孙文的归国，处于僵持状态的革命政府组织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他也得以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但这时他所起的作用也只不过是等待“项城反正”罢了。正如吴玉章所说，让位于袁世凯是早已确定下来的方针，现在即使有了孙文，无论如何他也冲不破这重巨大的障

壁，这件事已经集中地反映出了孙文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所面临的失败命运。

概括一下我的这篇不成样子的报告，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辛亥革命，是以孙文领导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革命阵营内部对孙文的非难之声高亢同时同盟会又处于分裂状态等情况为背景而开始的。当时，孙文对革命的领导权正处于最低点，而由反孙派为主导领导了革命，孙文视为基础的广东集团革命党人也无法从正面影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是在孙文最难发挥其领导权、统率权的关头发动的，这对于孙文也好，对于革命的归趋也好，都不能不说是一场大悲剧。

（2）在是否迁都北京的议论中以及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孙文难以发挥其领导权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文在《孙文学说》第六章中对自己为何会生“退职之心”的说明，有极深的含义。后年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文甚至不惜与以黄兴为首的一批老同盟会员分道扬镳，也要坚持“服从孙先生”这条党规，这与他从辛亥革命中所得到的教训大概是有联系的。

（3）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卓然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也具有无法抗拒的、不可思议的魅力。然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孙文的时代。我愿以这句极自然、极平凡的话语来自戒，避免使自己重犯过去有关评介孙文著作中所犯过的诸种错误。

注 释

① 野泽丰：《孙文》41—4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19—422页。

③ 同② 536—537页。

④ 《孙文学说》第八章。

⑤ 同② 544—545页。

⑥ 同② 582页。

⑦ 同⑥。

⑧ 《黄兴集》93页。

⑨ 同② 563页。

⑩ 《孙文学说》第八章。

⑪ 同② 580—581页。

⑫ 据《胡汉民自传》。

⑬ 《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392页。

⑭ 《黄兴集》94页。

（本文原为1985年11月“孙中山研究

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赵 军译）

孙中山和惠州起义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 横山宏章

前言

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当中的第二次，1900年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爆发，因无成功希望而于同月22日以解散革命军而告终的一次反清起义。孙中山计划先在台湾指挥，然后潜回大陆。在现场指挥起义军的是兴中会同志郑士良，起义军解散时据说兵力有二万人之多。^①

这是利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造成北方混乱的有利时机，在南方策划推翻清朝的起义。军事力量不足固然导致了失败，但考察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孙中山的外部依赖政策。所谓外部依赖政策，就是在起义兵力上依赖天地会党（秘密结社）的势力，并在军火上期待从日本得到援助。

孙中山到台湾后，会见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希望对惠州起义给以军火援助，得到了对方的谅解。有关兵力上依赖会党的史实我打算另撰别稿专述，这里只想就应当怎样解释孙中山为什么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代表儿玉源太郎合作的问题简单地作些探讨。

一 孙中山和平山周的证言

孙中山和儿玉源太郎的合作，究竟内容如何？代表性的

传记，如宿利重一的《儿玉源太郎》②、鹤见佑辅的《后藤新平》③，都没有这件事的记述。现在见到的材料只有孙中山本人的回忆和他的日本同志之一的平山周的回忆。

孙中山在1918年所著的《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中有如下记载：“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革命，以北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也，乃飭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④

按照这种说法，儿玉源太郎是“颇赞”（即非常赞同）孙中山革命而相约予以支援的，但由于在山县有朋内阁之后成立的伊藤博文内阁禁止援助，导致计划失败。

在这之前于1911年出版的平山周的《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⑤和孙中山的回忆录有较大的差异。“孙之所求于○○○○（后藤新平）在于武器援助。然而○○○○（后藤新平）以为，○○○○（日本政府）已改变占领厦门的意图，故难以立刻应允孙的要求。若孙以自己的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作○○（割让？）的口实，使日本得以抢夺占领厦门，而后才可为孙解决武器援助问题。孙中山为了再造支那全国，不得不许诺割让厦门一角，两者合作于此成立。”⑥

按照这种说法，儿玉源太郎方面并非赞同孙中山，只不过是以孙中山搅乱厦门为日本提供割让的借口为条件，而许诺予以支援。极言之：他是请求孙中山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爪牙，而孙中山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儿玉等人的要求表示